

目 录

前 言

侯方岳同志给宜良县党政领导机关的信·····	(1)
我在宜良开展工作的前前后后·····李 云	(4)
宏山风云录·····撒建云	(20)
——宜路陆游击大队斗争史略	
《宏山风云录》单项材料·····陈光逢等十余人	(63)
胜利六大队革命斗争史实·····杨自知杨德双收集整理	(93)
抗战时期宜良地区防空监视网情况·····施 成	(125)
何长寿营长殉国纪念碑序·····徐增树抄录	(128)
毕士茂营长殉职纪念碑序·····杨 荟 段家齐抄录	(130)
宜良一中沿革·····摘自《宜良一中校友通讯录》	(132)
宜良女子学校始末·····陈 晔 郑杰烈	(139)
宜良民众教育馆见闻·····胡 选	(141)
宜良私塾简介·····胡 选	(142)
忆黑猫球队·····陈德昌	(152)

宜良人民医院解放前后发展情况·····	周庆苍	(157)
喷水洞发电厂概述·····	杨 荟收集整理	(161)
宜良实业公司始末·····	张维虞	(163)
狗街烤鸭香飘千里·····	杨德双	(167)
话说宜良烧鸭·····	胡 选	(170)
香高味浓色碧汤亮的宜良宝洪茶·····	宜良外贸局	(172)
宜良县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名单·····		(182)
宜良县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名单·····		(185)
征稿启事·····		

侯方岳同志给宜良党政领导机关的信

编者注：李云同志所写《我在宜良工作的前前后后》一文，承原省工委委员（李云同志从事地下工作的单线联系直接领导）侯方岳，在卧床治病中，认真审阅修改，并亲笔向宜良党政领导机关写信表达意见。现尊本人意见，将来信及李云同志回忆录一并发表。

侯方岳同志来信原文

中共宜良县委

宜良县委党史办

宜良县政协

宜良县人大

宜良县人民政府、法院公鉴：

你们好！兹值元旦，恭祝新禧，健康长寿！我重病住院。在打吊针的病床上，看完李云同志写的《我在宜良开展工作的前前后后》，深有感慨！

李云同志也是“一二、一”运动中的英雄，曾负重伤。此后，他回宜良瓦渡村、陈家渡及路南宏山区工作，是我代表中共云南省工委布置而执行的。我编写的干部教材几小本，至今他还能背诵若干段。一九四七年——一九四九年，我亲自去检查指导工作若干次，并无虚假。一九四九年一月

中旬，省工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后，省委书记……等推举我代表省工委赴南方局、华南分局参加联席会议及华南整军会议，达成“三、二二”“边纵”成立方案，继又奉中央电召和省委书记推荐，赴京参加人民政协和开国大典。虽远离云南，省工委和“边纵”对宜良、路南基本仍执行我原先布置的方案。矿山武工大队（八百人）与宏山大队（六百人）都是照我计划执行的。（最近几年，有些伪造我远离滇原因说法，是一个阴谋、是错误的，无档案文件根据。）宜良火车站、光德小学、时家巷、段官村、陈家渡、瓦渡村、昆明市马街及昆明小堆子巷11号……等联络站，都曾发挥不同作用。但有些同志只图近便，破坏我的严格规定，超额使用段官村、小堆巷两联络站，致造成张积谷家三代及我党干部共十余人被捕，受尽苦难。陈家渡、瓦渡村两站，主要是接待陆良、第三支队联络员刘刚同志（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壮烈牺牲）……等，也曾接待我与祁山、张子斋等住吃、看佛堂、开过会（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买酒肉、杀鸡鸭，刘辉康（滇越铁路总交通员）、李云、杨林及其全家负责保卫。解放后，在极左思想压力下，有些同志不认帐，矢口否认，过河炸桥，是不道德的。解放前，党中央只承认省委书记和我对云南党政军有代表权，有档案、电报、通知及《人民日报》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专载为据。解放后，变了！乱抓、乱开除、乱杀！白占鳌、杨林、刘辉康、李云……等相继蒙难。至今尚有刘辉康……等未平反，已平反者也不够彻底，均众所周知。个别人如有缺点错误，也应功过分论，圣哲如此。特致此函，务望实事求是。

李云此文可以发表。如有不同意见，有根有据、有证明

也可以发表。

即致

敬礼！

侯方岳（签字）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卅日于
昆医附一院于病207房，在打吊针床伏小餐桌而作。（盖章）

此稿可以随李云同志的文章一同发表，亦可复印给省、市、党征办、省委负责同志、省党案备案。

侯方岳（签字）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卅一日又及（盖章）

我在宜良开展工作的前前后后

原中共地下党宜良县北区区委书记

李 云

前 言

本篇回忆录，原只想写一写我四八年初到宜良活动亲身经历的史实。但是，当我提笔时，在我身边与反动派斗争英勇倒下的先烈和与我并肩战斗的战友们，在极左路线下含冤去世的件件往事，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使我不得不拉回二年写。即一九四五年冬至一九四七年冬我回宜良前的这一段有生命意义的岁月。然后，再写解放战争，籍以奠祭英烈，缅怀忠魂。

一、血的洗礼

一九四五年，我在省立昆华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简称“昆工”）读书，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无能，贪官污吏横行，广大人民群众衣不就身，食不饱腹，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景象，重现在人间。我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在进步师生的影响下，利用课余时间，读了《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讲话》和《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我开始找到了真理，看到了希望……。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欢庆这胜利的节口，渴望和平，建设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然而，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人民苦难，不顾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正义呼声，强行发动一场屠杀人民的内战。作为一个有正义感，怀着满腔热血的青年学生的我，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迫使我不得不和与我志同道合的青年一样，投身到反内战的行列里。我们利用学校舆论阵地，创办了《燎原》壁报社，积极传播“反内战，要和平”的正义呼声。不久，昆明各大、中学校反内战力量，汇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向着黑暗，向着腐朽专制势力冲击。为此，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他们派军队包围学校，开枪威胁；派特务捣乱会场；利用手中掌握的宣传工具——报纸，大肆污蔑学生的正义行动。反动派的卑劣伎俩，更加激怒了昆明大、中学校的师生。各学校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有组织地波澜壮阔的罢课活动。“昆工”学生由地下党员王以恬为首，组织了包括我在内的各壁报社代表开会，成立“壁报联合会”，作为领导罢课的核心。我毅然地参加了该核心组织，领导罢课活动。

敌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恐吓、诽谤达不到目的，疯狂镇压就成了他们维持即将灭亡的看家本领。于是一场震惊全国的“一二·一”屠杀惨案在昆明——在我的身边发生了。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大批身穿军服的军官总队人员及便衣特务，打进了联大师范学院。该校与“昆工”只一墙之隔，打开窗子，我们就能互相往来。目击军、警、特务横行，支援师范学院同学刻不容缓，我们“昆工”百多个同学，立即从窗子跳进师范学院，将暴徒们赶走。师范学院的一位女同学和我冲在

最前面。当暴徒被赶走后，发现师院的大门虽然关着，但大门上的小门却开着，我和这位女同学，急忙把小门关上。我见侧面有块靠在大墙上的大木板，就急忙去抬来抵门，正当我钻到木板下面去抬木板时，暴徒们从墙外投进两颗美制松球手榴弹，那位女同学随着爆炸，应声倒地，她手指被削去，鲜血淋漓；大木板挡住飞来的弹片，我幸免于难。当我从木板下钻出来时，一个身穿军装，挎着“马龙头”（军官武装带）的家伙，抽出佩剑向我杀来，我急转身，刺破了胸前衣服！该暴徒转身向倒在地上的女同学的小腹、阴户处连杀数刀，其残忍行为，令人发指！我刚想跑开，却被几个暴徒赶到，用木棍向我的手部、腿部、头部猛击，特别是头部右侧被打得血流满背，从而不省人事倒在血泊中。

后来，我才知道那位为正义而勇往直前献身的女同学，就是潘琰；在我后面被屠夫们的手榴弹夺去生命的还有：工校同学张华昌和师院的李鲁连同学。他们的生命之花，刚进入盛开时期（张华昌年仅十七岁），壮志未酬！然而，为了人民的胜利，他们都英勇地贡献出自己年青的宝贵生命！

我被打伤后，同学们把我抢救送进云大医院，住院后发高烧转入甘美医院（现昆明人民第一医院）。治疗两月余，伤势好转，出院返校。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是个难忘的日子。全昆明市数万师生，为“四烈士”出殡，把烈士送到永久的安息地——联大院内安葬。在这难忘的日子后的第十三天，即三月三十日，我经王以恬同学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血雨腥风的洗礼。从此，我就在党的领导下，投入为消灭反动派，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革命行列。

二、倡办学校、奠回乡活动基础

一九四六年五月，组织上关心我的健康，决定要我休学回家调养。经调养一度时间，心情较为平静，身体也随之有所好转。目睹乡里孩童读书（五、六年级），要跑七、八公里路程到北古城的狗街子，方能就学。我童年读高小的艰辛，依然如故。我想，何不借此机会，就地办所高小，让附近七个村寨的三所小学（一至四年级）的毕业生，就近读上高小；另一方面党的工作重点要转入农村，与国民党反动派作长期的艰苦斗争，办起一所中心学校，可为党转移农村，奠定一块立足的基地。

主意打定，顾不了体弱，立即走访乡绅，进行游说。由于老百姓都想让孩子多读两年书，乡绅们也想让自己的子女就近入学，可以省几文钱，加上我是附近少有的到省城读书回来的学生，因此，游说效果很好，一拍即成。学校由各村推出代表组成董事会，并推举了一位忠厚、老实的知识分子黄贵云任学校领导。将三所小学的经费、桌椅集中使用，不够的作了添补。校址定在七个村寨比较居中的北墩子村小学。校名定为：“风来中心分校。”

学校筹办就绪，我复学时间已到，于是，便回“昆工”复学，地下党在“昆工”正式成立支部，高志远代表上级党组织指定我任支部书记。为了直接掌握学校的合法组织——“学生自治会”，籍以向国民党作斗争，支部决定：要我参加竞选学生自治会主席。我执行了支部决定，竞选获胜，公开担任“昆工”学生自治会主席，我们又投入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

一九四七年寒冬，刚考完毕业考试，我便接到地下党昆

明市委委员高志远同志通知，叫我“到文明新街茶楼，在左楼口的第一张桌上会见一个人，他面对楼口，头戴深灰色礼帽，身穿长衫，个子中等，茶桌的右角放有一包香烟，烟上放有一盒火柴。姓方，见面你叫声方老师。今后，他就是你的直接领导人了。工作，他会给你安排。”（后知，方老师名伯华，是中共地下党滇工委委员侯方岳）。接上关系后，侯方岳同志派我回家乡——宜良开展地下工作。任命我为“中共宜良县北区区委书记”。

三、以学校为阵地，站住脚根

一九四八年春，由于倡办凤来中心分校的缘故，当地人民和士绅对我的好感，因此，我走马上任担任学校领导。任职后我向董事会说明，“有一批好老师，要请到学校培育学生”。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后，我便与原分校领导黄贵云商议：有事托其应筹，校内由我安排（黄在宜良教育界比我熟悉）。议定后，由黄贵云老师写一呈文给教局，托词说明去年雨水不调，栽种推迟，校租收不着，今年老师暂由地方推荐四位代授课尽义务（老师一般都由旧教局委派），并拟了三个假名同时具报。后来，由侯方岳同志派来地下党员刘辉康、金绍平及王家德等同志到校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开展地下活动。当然，首先是要教好书的，这是关系后代继承革命的大事，也是能否站住脚根的关键。如何教好书呢？不能按国民党反动派编写的教材去毒害青少年，特别是高年级的《公民》课，（即现在的政治课），我们针对课文内容，进行反驳，以揭露的方式去教；《历史》课，我们以范文澜编写的《中国通史》为兰本，并加社会科学课程作为教学内容，使学生心田上，播下进步思想的种子。

凡到学校工作的党员，个个都是踏踏实实地干。虽然时间不长（因革命斗争需要，逐步调走），俸薪低微，但学校却办得生气勃勃，课余时间，大家便深入到贫苦农民中间访贫问苦，讲：“为什么会穷？穷根在哪里？”刘辉康同志还自备了一些药品，免费为贫苦农民治病，深受群众欢迎。从而使我们站住了脚，扎下了根。

难能可贵的是：黄贵云老师，虽系党外人士，但在复杂的环境中，能顶住国民党旧教局的压力，甘愿承担风险，为党忠心耿耿工作，实属难得。

四、完成一项特殊任务

为了积极开展云南武装斗争，需要筹集资金，支援部队。刘刚同志将三支队缴获敌军和恶霸的“特货”（鸦片烟）数百两，从陆良运到牟田。党组织通知，由我接运到瓦渡村，存放在我家里。侯方岳同志对此十分重视，要我“找一个信得过的，可靠的人出售。战争需要经费，需要医药，不能暴露，否则，是要掉脑袋的”。根据领导要求，我选择了白占鳌，并向侯方岳同志汇报了白的情况，讲明与我还有郎舅关系，经侯方岳同志同意后，我将约四百两烟土交与白占鳌出售。白占鳌同志担着莫大的风险，忠实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为了严守机密，他大都是在更深夜静时，去找买主。因为这批大烟质量不好，人称：“雨滴浆”，所以增加了销售的困难。但是，白占鳌同志并不因此而动摇，他千方百计地按党的要求，把大部分烟土销售出去。剩余小部分，实难售出，最后交给邑市马街张志尚志。

白占鳌同志完成出售烟土任务后，随着游击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调宜路陆游击大队搞军需工作。经过长期考验证

明，本人忠诚党的事业，对党有一定认识，积极要求入党。一九四九年三月，在路南县冒水洞，由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极左路线影响下，无端被诬为“反革命”，含冤被害，且株连全家及其亲友。直到一九八七年才平反昭雪。

五、建立秘密联络站

革命形势在发展，滇东南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滇工委与游击区的往来日愈频繁。为了避免暴露目标，确保来往革命同志的安全，经研究决定，选择江头村火车站作为出入口较为妥善（宜良火车站为交通要道，易担风险；瓦渡村虽安全，又要绕道二十多华里，甚为不便。）。为此，侯方岳同志要我在北古城附近，选择合适地点，建立秘密联络站。

我遵循领导指示，考虑再三，觉得陈家渡村杨李氏（我的姑母）家，是个很理想的建站地方。这里，距江头村火车站仅五华里，比较隐蔽，过往住宿方便，可以减轻宜良火车站、光德小学、段官村三个交通站的负担。在政治上，杨李氏绝对可靠。她丈夫年仅四十多岁，就被本村恶霸残害致死，她对反动派怀有深仇大恨。五个子女都是纯朴的青年，她是一位慈祥、善良、贤惠的老人。

我把情况向侯方岳同志一一作了汇报，并亲自带他前去食宿、查看。侯方岳同志表示满意，当即批准在陈家渡杨李氏家建立秘密联络站。

一九四八年春，我受侯方岳同志指示，要将杨李氏的大儿子争取回家，为党工作。当时，杨林在普洱县国民党县政府任合作金库主任，对国民党的腐败极为不满。我在昆明工作期间，知道他是一个思想进步的有志青年，读过一些革命理

论书籍，向往革命，向往共产党。经我做工作，杨毅然辞职回家，参加联络站工作。

杨林同志，工作表现很好，经党组织的帮助和教育，他的组织觉悟不断提高，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向侯方岳同志汇报后，侯亲自与杨林谈话，当即批准，并于一九四八年四月，我作介绍人，省工委代表侯方岳同志为监督人，在杨林同志家中，正式举行了入党仪式。从此，杨林同志便担任了陈家渡村杨李氏家联络站的负责人。

这个联络站建立后，开展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求积极发现联络进步人士，做思想工作；另一方面是负责接送过往党的高级干部。进步人士中，大塘营发现谢初新，安家桥发现韩复元都要求进步，行动可靠，且与陈家渡较近，都是由杨林同志出面与他们联系，做思想工作。后来，谢、韩都分别参军、入党。并担任教导员和指导员等职。

杨林同志，工作十分积极，在到苏羊村、夏官营做掌握有地方武装人家的秘密渗透工作中，由于急于夺枪，行动过急而暴露，不能再工作下去。经向侯方岳同志汇报，决定把杨林交刘刚同志带至陆良，找杨守笃司令员参加三支队，后担任该支队军需主任职务。

杨林同志去三支队，联络站继续工作，由其母亲、妻子、弟、妹坚持。此联络站先后接待过侯方岳、祁山、张子藩等高级领导及省工委——陆良联络员刘刚……等同志，一般工作人员不计其数。侯方岳、刘辉康和我属常来常往者。来往人员都食宿于杨李氏家，老人年青守寡家境贫寒（土改时，划为贫农）。但是为了支援革命，他们一家人节衣缩食，无代价地为同志们烧水煮饭，杀鸡、宰鸭，安排食宿。

最使我难忘的是，每当吃饭时，总是先让“客人”们吃那又白又香的大米饭，待客人吃好后，他们一家才围在厨房里吃蚕豆饭，毫无怨言。在政治上，他们严守党的秘密，直到解放后，都无人知道这个联络站。从而，保证了来往人员的安全。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五、六日（省工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后），侯方岳由昆明带领祁山、张子斋等首长，到杨李氏家研究工作，刘辉康和杨林一家人为之站岗、放哨、守夜。我党从昆明采购的一批批医药物品和修理枪械的工具，也都是通过这个联络站，由刘辉康同志转送到圭山、西山根据地去。

杨李氏的一家，是革命的一家。除三儿子杨根被国民党抓兵出去，不知死活外；长子杨林参加三支队，任供给主任，解放后任武定军分区后勤处长；次子杨顺在宜良铁路段加入地下党，做铁路工人的工作，病故；四子杨永坤，由在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警卫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运宗招募入伍，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侄子杨世昌，奉命潜入保安团，参加了云南起义；小女杨智仙，解放初加入共产党。这位革命老人，为了革命，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然而，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杨林同志因“所谓历史问题”被乱扣帽子，迫害冤死，并株连家庭及其弟妹。杨永坤、杨世昌在解放军队伍中干得不错，也被遣返回乡为农；杨林同志爱人满怀愁肠而亡，丢下五个年幼子女，养育重担再次压到杨李氏老人身上。老人茹苦含辛，任劳任怨，把五个幼子再度养大成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杨林同志的冤案得以政治平反，恢复了党籍，受株连的弟弟也解决了问题；省工委委员侯方岳对杨李氏及其家庭亲自批示：“立有革命功劳，不可

抹灭”。杨李氏虽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但对革命的高尚情怀，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六、从战争中学会战争

1、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是实现党对人民武装部队的绝对领导权的基础。

一九四九年，解放战争全面反攻，“边纵”日愈发展壮大。同年四月，我和刘岱林同志奉命到宜良、路南边区，参加铁厂整编，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三支队宜路路陆游击大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三支队宜路陆游击大队”。刘岱林同志任教导员、我任副职（原教导员谢初新另有任务）不久，刘岱林同志调走，边纵命令由我任教导员。这是一支拥有五百四十八人，由汉、彝、回、苗组成的人民武装。如何把这支部队建设好，对我这个年青、体弱、缺乏社会军事知识，远离领导独当一面工作，确实是一次新的考验课题。好在干部战士都痛恶旧社会，痛恶国民党反动派，热爱共产党，欢迎共产党的代表到部队工作。我只有依靠大家，尽力而为完成任务，不辜负党的重托，不辜负群众希望。如何着手工作呢？军事工作，大队长撒建云是内行，是久经战斗的老手，我不能不懂装懂，应放手让人干，一定会干好；政治工作是我的本份，但是学习资料十分缺乏，我又知之不多。经反复思考，认定抓部队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是个关键。于是，把我平时学习保存的《经济学讲话》、《社会科学丛书》、《大众哲学》、《整风文献》、《土地法大纲》、《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书籍和我的手抄本《游击战争的战略和策略》、陈云同志写的《党纲党章提要》及《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支部工作》，侯方岳同

志缩写的《党的建设》、“七大”等全部搬到队伍里，让有文化的人阅读、抄写。另一方面，我着手抓建党的准备工作。

部队的党员发展工作，首先是从干部入手的。一九四九年六月，发展了在战火中经过考验的连指导员何建华入党，她是整编后发展的第一个党员。接着又发展工作表现好，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寸时英、张志能两同志入党。党支部成立了，我任支部书记，何建华、寸时英、张志能为支委。部队建立党支部后，工作更加顺利，组织建设进一步得到了发展。一九四九年秋，部队改隶边纵二支队，到解放战争结束时，该部队发展党员仅三十五人，都是严格按党员条件发展的，并未放手发展。

值得总结的是，在发展新党员入党时，认真地进行党的历史、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及《反特务斗争》《反奸细斗争》（侯方岳编的一寸半手抄小册子）教育。要求党员把毕生精力，直至生命献给党的事业。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心一意，不是三心二意。严守党的机密，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作好不幸被捕、坐牢、严刑拷打和敌人施用的各种阴谋诡计的精神准备，永不叛党。在战斗中要求党员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身先士卒。

由于在部队中抓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党员处处以身作则，行军、作战、学习、训练都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以自己的行动影响群众，从而使整个队伍的素质和战斗能力显著地得到提高，实现了党对部队的领导。

2、在严峻的战斗中，考验部队，考验党。

一九四九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在全国各个战场节

节败退，蒋家王朝濒临灭亡。然而，反动派并不就此甘心，仍妄图以西南一隅，作为反人民垂死挣扎的基地。为了实现其反动目的，他们集中兵力，疯狂扫荡游击根据地。因此，当全国人民欢庆新中国诞生之日，云南却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之时。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我部奉命到圭山与其他兄弟部队汇合，成立护乡第三团。我部编为二营，撒建云同志任营长，我任教导员。护乡团的主要任务是牵制、疲劳敌军，相机歼灭，为主力部队送情报。我部在圭山区回旋二十余日，感到疲劳，十月二十五日迺至大哨村宿营。二十六日晨大雾弥漫。早饭后十时许，团部通知打扫卫生，各自洗衣物。此时，大雾还未全消，狡猾的敌军身着便衣，向大哨村扑来。我哨兵问口令不答，突然猛冲到哨兵面前，一哨兵被杀，另一哨兵鸣枪报警。营长撒建云闻警后，立即组织部队抢占制高点，仓促应战；我仅带着六、七个人，奋力冲上一个小山包，阻击敌人，掩护突围。李兴有同志卧在我左侧，不幸被一弹从左耳穿通右耳，满脸鲜血，一声未吭，壮烈牺牲。

战斗越来越激烈，凡是山地战能用上的武器，敌人全用上了，六零炮、八二炮、轻、重机枪、冲锋枪、步枪声响成一片，震撼着大地，整个战场硝烟弥漫。在阻击敌人，掩护撤退，基本达到预期目的后，我令撤退。我们五、六个人边救护伤员，边往路南天生桥方向转移。到天生桥时，已暮色降临了。热心的群众，为我们烧水煮饭，当地一位草药医生，为伤员敷药，再次体现了军民鱼水深情。

十月廿七日晨，我带领五、六位战士，重返大哨村收集牺牲烈士的遗体。我们到达时，民兵已收集在一起了。我逐一辨认，写下姓名，装入烈士的衣袋内。拜托大哨民兵埋